

流動的資本與走出去的中國：以香港無線電視 產業的資本併購與執照審查為例

戴瑜慧*

投稿日期：105 年 10 月 8 日；通過日期：107 年 2 月 28 日。

* 戴瑜慧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e-mail: taiyuhui@nctu.edu.tw。

本文引用格式：

戴瑜慧（2018）。〈流動的資本與走出去的中國：以香港無線電視產業的資本併購與執照審查為例〉，《新聞學研究》，135: 1-47。

DOI: 10.30386/MCR.201804_(135).0001

《摘要》

近年華語媒體市場的資本活動與引發的爭議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深刻影響區域發展形貌。由於香港無線電視產業在區域裡的重要性與經歷諸多媒體變化形式，如所有權變更、併購案、新執照審核，具有反映區域變化的代表性。故本研究以香港無線電視產業為例，分析 1997 年到 2017 年，香港亞視和無線電視的所有權變更，以及港府在 2009 年宣布開放新無線電視執照後的政策爭議。本文強調對香港媒體環境的分析須放置在鉅觀的歷史脈絡方能理解，特別是與中國政治社會的辯證關係。故文獻部分，首先爬梳中國發展模式下的侍從主義；中共領導層的政治思想——「向外的主權觀」、「敵我對立觀」；走出去政策與金融資本的關係。研究結果指出中國的「文化走出去」政策與習近平政權的「中國夢」主張，強化中國政府對港媒的控制擴張。擴張手段主要透過侍從政治與金融資本的結合運用，迅速改變港媒所有權與政治立場。同時，中國官僚資本亦在法律豁免下逐步浮出檯面，林鄭月娥更提出去管制化，放寬對非本地資本的限制。灰色侍從政治的隱匿性，對香港法治的規避，已經造成法治治理危機，侵蝕社會民主原則。

關鍵詞：侍從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走出去、中國夢、併購、金融資本

隨著中國在 2008 年之後積極推動「文化走出去」政策，與中國似有關聯的媒體併購案，也在各地展開。例如 1992 年後企業重心移向大陸的台籍資本家蔡衍明，在 2008 年底回到臺灣，以 204 億臺幣收購中時集團。在大陸經營房地產和銀行的中國全國政協委員王征，出身江蘇移民香港，在 2010 年入主虧損纍纍的香港亞視。以買賣空殼公司聞名的香港殼王陳國強和臺灣電子業龍頭 HTC 集團主席王雪紅，在 2011 年攜手入主香港無線電視台。「深圳王」黃楚標，身兼廣東省政協委員，以其在深圳房地產與酒店業的勢力獲此封號，也在 2011 年成為香港 DBC 電台大股東。兩位中國首富級的資本家阿里巴巴的馬雲以及萬達集團的王健林，亦積極迅速的收購媒體，被稱為媒體大亨。

對於引起外界好奇的媒體併購案，這些投資方紛紛表示出於興趣、夢想以及不介入的態度。例如蔡衍明強調「這是我的興趣，也是我從小的夢想，就像開飛機一樣…我是把媒體當公益事業在辦，不是用來賺錢！如果做好了，股東們把紅利分一分，屬於我的部分，統統拿去做公益……」（林靖東，2012 年 5 月 8 日）。亞視長年虧損有如錢坑，為表有備而來，王征表示以本業的房地產來養亞視，「花了 20 億已經買了上海的三個經濟開發區的一部分，每年的收益足以彌補亞洲電視目前的虧損」（譚璐、蔣雲翔、鄧紅葉，2010 年 3 月 12 日）。馬雲則在 2017 年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澄清，「外界有傳阿里巴巴操控二十間媒體，不過阿里真正控制的媒體就只有《天下網商》和《淘寶天下》…除此之外，我們從不干預媒體。如果商業影響媒體做獨立判斷和思考，就亂了套了。我們入股南華早報，不是對新聞感興趣，而是需要新的技術資金支持，這也是我們進入微博的原因」（〈談投資《南早》 馬雲：從不干預媒體 入股非對新聞感興趣〉，2017 年 12 月 4 日）。

看似懇切的語言，有時不僅與行動相悖，甚至只差個一年，語言邏

輯就大不同。以馬雲為例，他首先在 2009 年創辦《淘寶天下》，於 2010 年建立《天下網商》平台，推動電商事業。2013 年開始進入多方位的媒體收購案，包括入股新浪微博，海外社交媒體 Tango 和 Snapchat。中國科技媒體如《虎嗅》、《36 氦》、入股第一財經、華數傳媒。攜手財訊集團和新疆政府投資《無界傳媒》，聯合四川日報成立封面傳媒。更在 2015 年 11 月接連斥資 45 億美元收購大陸最大的視頻網站《優酷土豆》網和以 20.6 億港元從馬來西亞富商郭鶴年手裡買下《南華早報》集團，自此阿里巴巴的媒體版圖擴張到香港。

2016 年《南華早報》長文刊出新老闆馬雲的專訪。當中馬雲提到收購的目的是為了向世界介紹更正面觀點的中國，「讀者有權利認識一個客觀、真實的中國…我們應該讓讀者從更多的角度來認識中國」（周松欣，2016 年 4 月 21 日）。同時，也有建立全球性媒體的企圖，「阿里巴巴希望透過我們的技術和資源，協助《南華早報》成為一家全球性的媒體。《南華早報》憑阿里巴巴在中國、在亞洲擁有的資源，可以令整個世界更好地了解亞洲、更好地了解中國」。並認為香港的問題在內部，在「輸入的不良元素」，必須緊靠一國兩制，香港才有未來，「香港的問題並非源於內地或西方國家，而是源於內部。香港愈來愈欠缺包容…在一國兩制下，既可以享受到中國發展帶來的好處，也可以吸收西方精萃。香港是開放的城市，所以有時候也會輸入不良的元素。中國並不希望香港走向衰落，我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周松欣，2016 年 4 月 21 日）。

所以是 2017 年的馬雲否定了 2016 年的馬雲，還是在自家媒體上發言讓馬雲感到比較鬆坦自在？答案或許依舊反反覆覆，但都顯示資本的運動已經劇烈衝擊媒體產業的生態，震幅不僅影響中國一、二、三線城市，也遠達香港、臺灣與美加英澳等國。資本與媒體的運動，已成為備

受注目的議題。

但這場規模龐大的運動，參與的棋手有誰？棋路如何？棋局又會如何發展？誰是當中的過河卒子？誰又將誰一軍？對於這樣的探問，學者沒有觀棋不語的奢侈，因為棋盤就座落在身處的社會中。而目前的幾著棋起棋落，更在近年迅速改變港臺媒體面貌，與當地社會產生強烈的碰撞。向來處於臺灣社會運動邊緣的媒體議題也被時勢推向前沿，在 2012 年 9 月有高達萬人上街表達「反媒體壟斷」。同年 10 月香港市民也對黃楚標迫使 DBC 電台停播進行抗議，高達 7 萬的市民參加「爭取 DBC 復播運動」的集會。2013 年 12 萬香港市民抗議港府未說明理由就拒絕核發給王維基新的無線電視執照。乃至 2014 年在臺灣和香港爆發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抗議的內容呈現兩地民眾對媒體現況的不滿與未來的不安。

這個正在成形的華語區域媒體市場，像是沸騰的池塘，資本活動頻繁，卻看不明來龍去脈，引發的猜疑又造成社會情緒滿溢，反覆相互作用下，越發滾燙激越。香港的無線電視產業是區域裡的重要媒體機構。同時，諸多媒體變化形式，如「所有權變更」、「併購案」以及「新執照審核」，都曾經發生，具有反映區域媒體變化的代表性，故本研究將以此為切入點，管窺華語區域媒體產業的發展情勢。1997 年之後，中共政權正式擁有香港的統治權，其發展模式深刻捲動香港與區域的發展。文獻探討部分將爬梳中國發展模式下的侍從主義。第二部份則是中共領導層的政治思想分析，包括「向外的主權觀」與「敵我對立觀」的歷史形成，以理解「走出去政策」的思想背景與資本的策略運用。最後以香港無線電視產業為例，檢視所有權的變更以及新執照的審批，當中牽涉的資本運動、不同資本形態如「中國官僚資本家」、「中國私營資本家」以及「海外侍從資本家」之間的角色關係以及造成的影響。

壹、中國發展模式與侍從主義

自從 1988 年 Andrew Walder 出版《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以來，許多研究會引用侍從主義的理論（patron-client theory）來解釋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Walder（1988）的研究指出中共在 1950 年代左右透過「政黨－侍從主義」的方式使社會（特別是工人）依附於政黨，以利於社會控制。在「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模式下，透過「制度性的依附」以及「權威的制度文化」，迫使工人對黨政幹部高度依附，形成上下間的施恩回報關係網絡。此種垂直的侍從關係分裂工人群體的團結性，促使個人以與上層發展私人關係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

1978 年鄧小平以改革開放政策開啟後毛時期，而侍從主義會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受到何種影響也成為學界探究的問題。市場轉型論者如 Victor Nee（1989, 1991）抱持著新古典經濟學對完美市場的假設，認為侍從關係只是中國從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期間的暫時現象，一旦建立起完善的產權與契約制度後，這種特殊主義的關係將會被市場的交易關係所取代。

David Wank 則否定這種說法，引用「鑲嵌理論」（embeddedness of theory），他認為所有的經濟行為都必須鑲嵌在具體的社會網絡中。而市場轉型論者卻忽視具體社會處境，預設市場經濟可以消除特殊主義，理性官僚組織是最有效率的運作制度，完美的市場終將抑制侍從主義和貪腐行為。他認為特殊關係網絡並不會減少或消失，而是從過去的侍從主義轉變成新型態的貪汙網絡（corruption network）。透過比較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末期的貪腐行為，Wank 指出中國的貪腐行為為已

經呈現常態性的，大規模的，從下層官員到上層官員都牽涉當中、官員之間彼此拉攏的「多線式」的貪汙網絡（Wank, 1995, 1999, 2002）。Margaret Pearson 也認為侍從主義在改革開放政策下依舊存在，只是會從正式轉向非正式。只要官商關係缺乏正式的建制、興起的經濟菁英缺乏政治代表，和官員發展私人關係就成為有吸引力的選擇（Pearson, 1997, p. 35）。

Wooyeal Paik 和 Richard Baum 指出各種體制都有侍從主義的現象，但中國因為連半競爭的選舉（semi-competitive election）都沒有，官員的權力更不受抑制，而有其特殊性，將此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侍從主義」（cliente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認為侍從主義是結構性的問題，發展主義的誘因結構所致，並不會因為家父長的新儒學道德勸說或是打貪運動而停止。而享有土皇帝般權力的地方官員和紅色資本家在可見的未來將會持續掠奪老百姓，引起不滿抗議，損害中共的執政合法性（Paik & Baum, 2014, p. 700）。Yuen Yuen Ang（2016）認為侍從主義以及政黨的收編政策，造成中國官僚體制與公務員人數持續膨脹，而地方官員為了維持社會控制，也沒有意願裁減幹部人數。

這些研究指出中國的侍從主義是結構性的問題，黨官僚因掌握中國市場的接近權以及國家資源的分配權，使其享有庇護主的高位。而媒體產業因為被中共列為緊抓的意識形態障地，對其市場接近權與管制更加嚴密。李金銓、何舟和黃煜即以「政黨－市場統合主義」（party-market corporatism）與「侍從主義」的概念解釋中共藉由給予中國媒體經濟獨佔的利益換取其政治支持與形象宣傳（Lee, He, & Huang, 2006, p. 24）。根據香港 2016 年記者協會發布的香港新聞自由年報，香港媒體的所有人，除了壹傳媒集團外，幾乎所有的主要報章、電台和電視台的老闆，都獲委任為人大、政協等職務（香港記者協會，2016），顯示傳

媒產業是侍從主義表現特別突出的場域。

貳、侍從主義的活躍場：官場與商場

1992 年鄧小平南巡，此後市場經濟在中國大力騰飛，企業與資本家崛起為中國社會重要的行動者，也成為學術研究焦點。1990 年代有眾多中國研究聚焦於侍從關係的研究，特別是私營企業與地方政府的關係（Choi & Zhou, 2001; Nee, 1991; Pearson, 1997; Solinger, 1993; Tsang, 1996; Wank, 1995, 1999; Young, 1995）。對於中國企業的研究，Curtis J. Milhaupt 和 Wentong Zheng（2015）主張要結構性的理解，提出以「建制的生態系統」（institutional ecology）分析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認為這個系統在結構上鼓勵所有的企業，不管是國營、私營或合資，都與黨國保持緊密的關係以獲得保護與好處。在國家中心的環境裡（state-centered environment），私營企業不像一般西方社會預設的擁有自主性，而是和中共黨國有緊密的關係。這關係主要包括三個層次：政治關係、國家支持（補貼、財政支持）以及法律之外的控制手段（協會、約談、產業政策方針）。有政治關係的私營企業可以獲得低成本融資、上市的機會、市場接近權等好處；沒有政治關係者，只能處於市場的邊緣（Milhaupt & Zheng, 2015）。中國國營企業以及大型私營企業，因此深刻的鑲嵌在黨國組織中（party-state organization）。兩位作者將菁英們在不同的機構建制之間穿梭輪轉的現象稱為「機構橋梁」（Institutional bridges）。國企與大型私企的高層，透過管理菁英（managerial elites）的輪調、人員交換、以及身具代表黨和政府的多重身分（multiple hats），在不同機構間建立方便穿梭互動的橋樑系統，構成緊密、穩定的關係網絡（Milhaupt & Zheng, 2015）。他們針對利潤前 100 大私營企業做調

查，發現有 95 家的私營企業老闆具有人大代表或是政協委員的身分（Milhaupt & Zheng, 2015）。

而中共黨國與私營企業的關係，不僅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重要社會特徵，更是影響中共政權生存的關鍵因素。對中共政權適應力與生存力的研究指出，中共成功吸納收編新興資產階級，是中共得以在深刻的合法性危機下，持續掌權的原因（Pearson, 1997, 2002; Dickson, 2003, 2008, 2010; Chen & Dickson, 2010; Kennedy, 2005; Jun & Girma, 2010; Tsai, 2011）。Margret Pearson 指出中國資產階級並非帶領民主改革的領頭羊。相反，他們是中共體制中的一部分，而這個體制的設計目的就是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避開民主化的衝擊（Pearson, 1997）。Bruce J. Dickson 認為中共為繼續執掌政權，對改革開放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如私營企業家、高科技專業者和其他城市專業工作者，採取積極的收編政策（co-optation），以預防這個群體成為將來的政治反對者。Dickson 將這個錢權緊密交織的結構稱為「裙帶共產主義」（crony communism; Dickson, 2008, p. 22）。他和 Chen Jie 訪問 2000 位以上的中國私營企業家，發現私營企業家對政治改革的態度相當保守且傾向維持現狀（Chen & Dickson, 2010）。Tsai Kellee 發現中國資產階級並不支持以政治改革成立正式組織直接推動訴求，而傾向採取適應性的非正式機制（adaptive informal institutions），在私下以間接的方式影響政策，而中共目前的政策方向也大抵符合其利益（Tsai, 2007）。

然而過去針對中共黨國與企業的研究，研究範圍主要針對中國內部的企業。例如 Dickson（2003）所指與中共有緊密私人與政治連帶的「紅色資本家」（red capitalists），型態包括兩類：第一類是「下海企業家」（xiahai entrepreneurs），早先在中國政府或政黨裡持有職位，隨著改革開放的下海潮，離開黨政職位，進入市場成為企業家。第二類是

「私營企業家」（private entrepreneurs），這些企業家先在商場成功後被中共吸納。

然而隨著中國向全球擴展，中共還與「海外資本家」積極互動。本文提出在考察中共黨國與企業家的關係時，應該更具體區分為三類：具有黨政職位的「中國官僚資本家」（Chinese bureaucratic capitalists）、「中國私營資本家」（Chinese private capitalists）以及持有海外國籍的「海外侍從資本家」（overseas clientelae capitalists）。並且以「建制的生態系統」進行結構性的考察，分析中共黨國與資本家，以及資本家之間在系統內的動態辯證關係。

參、中共領導階層的政治思想

一、中國夢與向外的主權觀

目前國際政治和國際法對於主權（sovereignty）的概念主要採用舊式以領土為依據的國家主權觀念（state sovereignty），亦即主權國家相互承認各自擁有領土之內的絕對統治權，能否有效治理內政是國際社會對主權的認定依據（Lewis, Sampford & Thakur, 2008, p. 2）。

批判地理學者哈維（David Harvey）提出兩種主導邏輯，一種是領土邏輯（territorial logic），一種是資本主義邏輯（capitalistic logic）。所謂的領土邏輯是指國家機器為了自身利益行使的各項政治、外交、經濟和軍事策略。這些策略的首要目的是控制和管理領土上居住人羣的活動以及在國界之內積累權力和財富。這些積累的權力與財富可以對內提高人羣的福祉（或僅僅造福本地資本家階級）；也可用作對外擴張，例如殖民佔領或是宰制其他國家。當本國出現狀況時，就可讓本國的剩餘

資本透過對他國資源、勞動力、生產力的控制，獲得新的出口，繼續維持資本的擴大積累（Harvey, 2010, p. 205）。資本的權力邏輯則是指私人或企業對利潤永無止盡的追求，這股金錢權力將不斷四處流動，摧毀時空國界的障礙，追尋獲利的機會。

但未必每個國家都會為了獲得投資出口或消費市場而對外擴張。除了與各個國家是否具有對外擴張的實力外，哈維強調社會思想心態有著關鍵影響：

統治國家機器的政治軍事領袖的心理態度也很重要，包括他們如何看待自身在國際社會的位置、對安全與威脅的感受、是否擔心被他國吸收融化、是否需要透過創造外在真實的或虛構的敵人來應對國家內部的鬥爭等等，都影響一國對外的態度。（Harvey, 2010, p. 209）。

哈維（2010）以納粹德國為例，指出德國地理學者浩胥福（Karl Haushofer）認為國家為了保證自己的未來，擁有正當權力去佔領其他國家的土地，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述為納粹的擴張主義提供支持。

而習近平政權的思想，又受到習在毛澤東時代的成長經驗以及血腥的接班鬥爭所影響。鄧小平之後，中共政治權力的繼承者是前任有計畫挑選培養的。符合「接班人」條件的人，通常是出身於紅色家族的後代（何清漣、程曉農，2017，頁 48）。儘管被江澤民、胡錦濤欽點為接班人，習近平卻遭遇了同為太子黨薄熙來的挑戰。歷經一番鬥爭之後，習近平在 2012 年 3 月 15 日，解除薄熙來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職務，9 月移送司法機關，鬥垮政敵，在 2012 年 11 月中共 18 大會議正式接班。並在第一個 5 年任期內，持續地以反貪、愛國之名，肅清政治敵人。

歷經腥風血雨鬥爭而取得大位的習近平，在一上任之後，就提出「中國夢」的口號。這個概念是在 2012 年 11 月 29 日，習近平率領其

他政治局常委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時首次提出，指出中國夢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九提「中國夢」〉，2013 年 3 月 17 日）。在 2012 年 12 月 8 日和 10 日考察廣州戰區時，強調「這個夢想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並強調，要堅持用打仗的標準推進軍事鬥爭準備」（〈習近平考察廣州戰區 登甲板上戰車〉，2012 年 12 月 13 日）。接著在 2013 年 3 月 17 日中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典禮上，將近 25 分鐘的談話裡提到 9 次「中國夢」（〈人大演說 習近平大談強軍中國夢〉，2013 年 3 月 18 日）。在「中國夢」的論述中，習近平強調要「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預計在 2049 年，中共執政 100 周年時達成目標（〈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2013 年 3 月 17 日）。

習近平的「中國夢」概念與 2010 年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的《中國夢》一書有著相同的名字，兩者之間的關聯也引發外界探究。劉明福的書當年雖熱銷但因恐妨害中美關係而撤下書架，但在習近平發表「中國夢」演講之後，此書不僅獲准重新印刷，並被國營書店陳列在推薦書區（Page, March 13, 2013）。劉明福在《中國夢》一書開門見山直指「成為世界第一，是中國的百年夢想」（劉明福，2010，頁 3），21 世紀是中美「冠軍國家」（頁 29）爭奪賽的世紀對決，並認為世界在中國的領導下會發展更好，「中國時代是世界的黃福時代」（頁 77）。劉明福的「中國百年夢想」，也與習近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後呼應。

劉明福（2010）認為建立強軍的理由之一是為了嚇阻外國介入中國事務。「外國因素」、「外力介入」是近年中共領導人經常提及的議

題，習近平就曾在 2009 年墨西哥出訪演講時談到，「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甚麼好說的」（〈習近平批評少數外國人對中國指手劃腳〉，2009 年 2 月 13 日），習近平也因此獲得「習三點」的封號。2013 年 3 月人大會議接任中國國家主席後，習近平首先出訪蘇俄，並在出訪演講中提出「鞋子論」，反對他國批評中國事務。習近平強調各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只能由本國政府及人民來管，這是處理國際事務的民主原則，國際社會應該共同遵守。並以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才知道作比喻，指出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國內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習近平：不應干涉別國內政〉，2013 年 3 月 23 日）。

在「強軍論」的論述裡，劉和習都一再強調中國百年的屈辱史、外國列強的侵略、落後就要挨打的思想，認為中國若無強大的軍事力量，則無法捍衛自身主權，並將招致被侵略宰制的下場。學者 Zhang Yongjin 指出由於清末列強侵略以及中共建政之後，高舉國家主義與反帝政策，在此歷史背景下中國形成「向外的主權觀」，強調捍衛國家的外部主權與維持領土完整。至於內部主權（internal sovereignty）的觀念，即國家主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的授予和對人權的尊重，則向來缺席，直至 1990 年代晚期才開始浮出（Zhang, 2008, p. 110）。

二、落後就要挨打——敵我對立觀

由於中國的主權觀緊密的和國族主義與國家安全聯繫在一起，維護主權的方式就展現為對外採取強硬姿態、展示軍事力量、不時宣誓主權並且展現誓死捍衛的決心（Zhang, 2008, p. 109）。此種主權論述隱含著

強烈的「敵我對立觀」，如劉明福認為美國無論如何都會將中國視為對手，所以中國也被迫必須將美國視為對手。論述中有著「被迫」和「正當」的雙重元素，因為情勢「迫使」、所以「必須」、因而為「正當」的邏輯。例如強軍不是為了打美國，而是為了不被美國打，若不如此就會引來「挨打」、「被淘汰」的亡國下場。亦即要維護中國主權，就要事先積極準備，提高自身的軍事戰鬥力、重要資源的掌控力、對中國領土與人民的控制力、乃至積極擴大中國對外的影響力，如此方能使整體情勢朝符合中國利益的方向發展。

由於現代國家（nation-state）和主權觀念（sovereignty）都在 16 世紀歐洲宗教戰爭期間興起，故時常被視為相等同的概念，對此學者 Wayne Hudson（2008）追溯歷史以及 Gerry Simpson（2008）對各種主權行使型態進行分類，指出國家與主權實則非互相等同的概念，需要更加仔細的檢視。臺灣與中國大陸目前存在尖銳的國家爭議，但經過持續的政治協商，臺灣與中國大陸當前的政治共識是互相承認各自政府在其有效治理的領土上所轄有的主權，彼此不介入不干涉。香港在 1997 年之後，主權由港英政府移轉至香港特區政府，但在一國兩制架構下施行港人治港。儘管表面上中共與臺灣主權相互尊重互不干涉，中共依照一國兩制政策由港人治港。但在實際政治運作上，中共則依循其「敵我對立觀」、「向外的主權觀」，積極佈置統戰政策，致力擴大中共對臺港的影響力，打擊中共所標誌的「政治敵人」。由於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伸張中國主權，只要能夠強化中共對香港的統治與推動臺灣統一，則無論手段與代價為何皆有不得不為的正當性基礎。

其政策態度也具體表現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 2014 年 6 月 10 日公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文中強調為了實現「中國夢」，因而對香港的一國兩制的制度做出進一步限制是合理

正當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2014年6月10日）。面對香港民眾的反彈，中共政權則展現出高壓的姿態。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表示，「佔領中環運動屬違法外，整個運動是反華力量圖謀篡奪特區政府管治權，若發生損害國家利益的動亂，中央政府會宣布戒嚴及軍事干預」（姚國雄、林俊謙，2014年6月8日）。歷經2014年的佔中事件，中港之間的矛盾衝突持續擴大。在習近平第二個五年，十九大之後新任的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被問到港獨的態度時表示：

「嚴重違法，絕不可行」，他解釋港獨主張就違反了《基本法》第一條，故9章160條的基本法全都違法，並反問「不是嚴重違法嗎？」，並稱港獨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全球全世界都零空間（〈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港獨嚴重違法在全球零空間〉，2017年9月29日）。

三、走出去與金融資本

2000年，江澤民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提出「走出去政策」；2002年，中共十六大正式寫入「走出去戰略」。至於怎麼走出去？資本與併購成為關鍵，強調透過國家資源的捐輸，扶植特定企業，打造出中國的跨國企業。由於歷經2008年奧運的聖火抗議，中共加速推動「大外宣」政策，建立中國銀行、中國私營資本家與海外侍從資本家的三角合作關係，進行海外媒體併購（戴瑜慧，2013）。

由於資本與資本家之間並非一體等同關係，當中身分的斷裂，使無形無色的資本可以隨時在不同的資本家身上附著停留，亦為資本的操作提供了操弄、保密、頂替、轉手的空間。1990年代以後，各項金融衍

生物、高度槓桿工具的發明以及低利率的環境發展出各式規避國家管制資本的手法，例如離岸公司（off shore company）和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就被廣為使用作逃稅、繞開法令規範以及隱藏股東身分、股權比例、收益狀況的工具。2016 年的巴拿馬文件，揭密莫薩克馮賽卡法律事務所，在國際間如何販賣離岸公司的生意，資料顯示中國是最大的客戶，單在中國就設立了 8 個辦事處，還有 1 個在香港，遠多過在其他國家設立的分行數量。有數千筆的資料牽涉到中國，更有 8 位太子黨成員捲入當中（Obermayer & Obermayer, 2016／寶強翻譯工作小組譯，2016，頁 288-289），顯示中國有著眾多意圖隱蔽身分的資本活動，而這些資本手段就成為中共走出去政策的有利工具。

由於大氣電波屬於公共資源，各國政府對無線電視的執照審核，一般強調執照取得人應有責任推動當地媒體發展，有益社會福祉。對於執照持有人的國籍身分、實質居住時間、以及跨媒體經營，亦會透過法律予以規範。本研究將分析香港法律對媒體保障本地福祉的規範，與中國政府意圖擴張對香港媒體的控制，兩者之間展開的矛盾與衝突。研究將以香港無線電視產業為例，檢視所有權變更、併購案以及新執照核發過程中，侍從政治與金融資本如何作用。為了更細緻的分析侍從政治的運作，將案例當中牽涉的資本家，分為三類，包括與中國政府相關聯的中國官僚資本家、中國的私營資本家，以及海外侍從資本家，以了解這三種身分在當中的角色以及力量的起伏。

肆、香港無線電視產業的所有權變化與新執照審批

香港無線電視產業長年以來呈現一大（TVB）一小（ATV）的雙元寡頭壟斷，然而此局面，卻在近年因為頻繁的資本介入與併購案發生劇

烈變化。本節將回顧 ATV、TVB 兩家無線電視台近年的所有權變動以及港府發放新無線電視執照的審核與爭議。

一、香港亞視（ATV）

亞視是香港第一個電視台，也如同香港，亞視的歷史深深烙著殖民主義的痕跡。亞視的前身為「麗的映聲」，1957 年由英國麗的呼聲公司成立。1981 年英國母公司投資失利，轉手給澳洲財團。直到 1982 年始由香港人遠東財團邱德根接手經營。但香港本地資本家治理的時期甚短，1997 年之後，中國軍方系統出身的劉長樂，旋即在 1998 年開始收購亞視股權，一連串的資本介入風波也正式揭幕。

根據香港《廣播條例》第 8(4)(a)(i)條規定，要取得香港免費電視台執照的公司，在居住地上必須符合如下限制，「積極參與督導持牌公司的過半數董事須通常居於香港，而且是最少曾於一段不少於 7 年的連續期間通常居於香港；以及公司的控制及管理均真正在香港作出及進行」。《廣播條例》第 3A 部對跨媒體擁有權也進行限制，避免所有權控制過分集中，列出「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包括：(a) 根據《廣播條例》發出的四類電視牌照（即免費電視牌照、收費電視牌照、非本地電視牌照和其他須領牌電視牌照）之一的持牌人；(b) 聲音廣播持牌人；(c) 廣告宣傳代理商；(d) 在香港印刷或製作的報刊（即本地報刊）的東主；(e) 對 (a) 至 (d) 段所述的人士或機構行使控制的人；以及 (f) (a) 至 (e) 段所述的人士或機構的相聯者。

由於鳳凰衛視董事長劉長樂在港居住未達連續 7 年，同時也擁有另外一家電視媒體的執照，因此其身分為「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為了取得亞視的經營權力，劉長樂透過擁有香港身分的「資本代理人」，房

地產商人封小平和香港機場管理局主席黃保欣，成立龍維有限公司和聯旺有限公司出面收購。因此形式上由封小平主政，但實際亞視重大決定均需要向劉長樂匯報請示（〈劉長樂上場 封小平下臺〉，2002 年 6 月 13 日）。

但「資本代理人」（人頭）的使用，本質上有個根本的風險，就是「代理人」未必持續遵守「藏鏡人」的意旨行事。由於封小平意欲自立門戶，與劉長樂產生矛盾，這場 2002 年紅色資本家內鬥的結果是封小平被迫將手上 24.12% 的亞視股權移轉給劉長樂和陳永棋。不同於 1998 年透過人頭間接持股，這次劉長樂直接要求港府給予行政豁免權，為其持有亞視大開特權綠燈。首先是國籍限制的部分，劉長樂表示：「其實他主要居住地是香港，不過前幾年才開始申請香港居民身份，現時尚差數月便可取得香港身份證。據現行條例，他增持亞視超過百分之十五的股權，要申請豁免，他已向有關當局提出申請」（〈劉長樂非港居民特准增持〉，2002 年 6 月 13 日）。第二個限制是不得擁有其他電子媒體，劉長樂表示沒有法律衝突的問題，因為「鳳凰衛視以普通話廣播，對象是全國以至全球華人，亞視以廣東話廣播，對象是香港以及華南居民，所以沒有衝突」（〈劉長樂非港居民特准增持〉，2002 年 6 月 13 日）。第三個限制是外籍人士不得持有超過 15% 的亞視股權。劉長樂同樣申請豁免取消門檻限制，得以成為亞視的最大股東。

此後亞視在 2007、2009、2010 年再度經歷股權變動，上述規避香港法規的手段如「申請行政豁免」、「資本代理人（人頭）」、「子公司設立」等也越演越烈。到 2009 年，臺灣籍中國旺旺主席蔡衍明入股亞視。為了繞開國籍限制問題，蔡衍明與查懋聲家族成立 Antenna Investment，共同持有 47% 亞視股權。不過，Antenna 分有 A、B 股，A 股有投票權，查氏佔 51%、蔡氏佔 49%，即是查氏擁有「話事權」。

B 股是利潤攤分權，100% 由蔡衍明持有。但查懋聲這位「資本代理人」後來卻又在 2010 年另尋王征合作，導致蔡衍明對簿公堂。蔡指出查懋聲曾有協議會將 2% 的關鍵性 A 股轉讓給他，或蔡氏的指定代理人，令蔡氏成為真正「話事人」（〈蔡衍明親述亞視股爭〉，2009 年 12 月 25 日）。

王征雖然在 2010 年 4 月之後實質控制亞視，但因王征也不符合廣電條例的適當人選，故在形式上須藉由查懋聲、盛品儒和黃炳均出面，王征在亞視的官方身分只是執行董事盛品儒的私人顧問。此等名實不符的藏鏡人式控制也引起香港廣管局在 2012 年 3 月進行調查，「認為王征實際上控制亞視，違反了 2010 年向廣管局作出的承諾，…王不符合《廣播條例》中所指的『適當人士』，當局建議重判亞視罰款一百萬元」（〈通訊局飭令亞視 踢走王征盛品儒〉，2012 年 6 月 28 日）。資本手段的隱匿性造就了「資本代理人-藏鏡人」作為規避法律手段的盛行，卻也毀損香港法律的公信力、阻礙亞視的發展，甚至出現蔡衍明與王征兩位「藏影人」鬼影競奪的景象。

儘管香港廣管局在 2012 年 3 月做出調查，指出王征實質控制亞視，並判處罰款。但實際上王征還是繼續操控亞視，甚至在 2012 年 11 月 11 日動員亞視員工在政府總部舉行名為「關注香港未來」的集會，反對港府發放新的免費電視牌照。王征在集會上大跳騎馬舞並稱「發牌將會是『災難』的開始，認為會令香港臺灣化及政治化」，並透過亞視不斷向社會播放其言論（〈亞視集會反對發新電視牌〉，2012 年 11 月 12 日）。亞視員工接受訪問時指出當時王征高度干預亞視運作，「嗰時我們同事成日都講笑，話我們應該改名做『王征台』」（亞裏，2015 年 1 月 5 日）。這次集會引發社會高度爭議，亞視主播胡燕泳也著文批評王征和盛品儒，「他們最近的大集會、言論、行為，着實超乎常人所

能接受的尺度」(胡燕泳, 2012 日 11 月 18 日)。胡燕泳則在 11 月 26 日連同其它 7 名員工, 突遭亞視解雇, 引起此舉是否為亞視秋後算帳之討論。

由於王征任內引發種種爭議, 香港通訊事務管理局於 2014 年 9 月 5 日, 以亞視的公司管理不符理想等理由, 向香港特首建議在 2015 年 11 月亞視執照到期後不予續牌。(〈通訊局不建議亞視續牌〉, 2014 年 11 月 25 日)。香港第一家電視台亞視, 遂在 2016 年 4 月 1 日, 正式結束 59 年的歷史。自 1998 年劉長樂透過港商介入亞視, 歷經 17 年各個資本家的輪番介入與政治操弄, 香港最悠久的電視台最後已是面目全非。自製戲劇節目幾乎消失, 改播便宜外劇, 節目不斷重播, 在 2014 年開始拖欠員工薪資, 到最後失去觀眾, 引起民怨, 也失去其政治宣傳的功能, 終而失去牌照, 畫下句點。

二、香港無線電視 (TVB)

香港最大電視台 TVB 由創辦人邵逸夫成立於 1967 年, 收視率長年遠勝亞視, 也是華語市場裡首屈一指的傳媒集團, 影響力橫跨中港臺三地。1993 年和臺灣年代集團合資成立臺灣的 TVBS 電視台, 直至 2016 年出售股權給臺灣 HTC 集團王雪紅。2004 年 TVB 獲得中國大陸廣東省 9 個城市的落地權。擁有全球最大的華語影視節目資料庫、橫跨三地的獨特地位使得 TVB 成為各方競購對象。

2011 年 3 月邵逸夫以港幣 86 億元將邵氏兄弟公司 26% 的股份出售給 Young Lion (YL) 公司。而這個公司係由「香港殼王」德祥企業主席陳國強、臺灣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以及近年積極在亞洲投資媒體, 管理 220 億美元資金的美國私募基金 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 (PEP)

共同組成（林孟儀，2011年2月9日）。然而這項媒體交易案，卻纏繞著重重的資本疑雲。首先是這個併購團隊的負責人陳國強，自身並沒有足以收購無綫的財力（〈殼王擅「代客泊車」 真正買家惹討論〉，2011年1月28日）。第二，香港《廣播條例》規定，免費電視台最終控制人須為香港居民（連續不少於7年內通常居港人士），控制人一般亦不得擁有其他電子媒體，否則便被視為不合資格（〈殼王買無線 巧佈股權避法例〉，2011年1月29日）。

針對第二個問題，陳國強採用與2009年臺籍蔡衍明收購亞視相似的做法。陳國強在2010年10月13日成立兼具「有投票權」和「沒有投票權」的空殼公司「Delight Gain」，陳國強為負責人，擁有「投票權」；王雪紅和 PEP 的股份不具有投票權（〈殼王買無線 巧佈股權避法例〉，2011年1月29日）。對於充當「資本代理人」（人頭），陳國強表示非常合算，何樂不為。由於香港廣電法規規定電子媒體最大股東必須是香港人，「只有我是香港人」，因此出資最少，但卻掌握5成投票權（林孟儀，2011年2月9日）。

1. 走出去的旗手——中國國務院下的 CMC，走入 TVB

雖然陳國強、臺灣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及 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 透過 YL 共同持有 26% 的 TVB 股份。但這三個投資者的持股分佈，一直沒有公開（〈TVB 染紅 新股東與大陸官方關係密切〉，2015年4月22日）。原本已經撲朔迷離的 TVB 產權結構，又在 2015 年發生變化。陳國強在 2015 年 4 月 22 日公開宣布，邀請與大陸官方關係密切的「華人文化傳媒娛樂投資有限公司」成為 TVB 的新股東。但這份聲明沒有交代這個第一個入主 TVB 的中資股東，究竟收購了多少股權（〈TVB 染紅 新股東與大陸官方關係密切〉，2015年4月22日）。

掌控「華人文化傳媒娛樂投資有限公司」的是知名的中國「官僚資

本家」，又號稱「中國梅鐸」的黎瑞剛。他出生於 1969 年，中共黨員，曾擔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SMG）總裁、上海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創立華人文化基金（CMC），是中國傳媒界的重要人物。CMC 旗下設有「華人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之下又有子公司「華人文化傳媒娛樂投資有限公司」。

CMC 是中共在 2008 年京奧之後「文化走出去」政策的產物。政策鼓勵下，上海東方傳媒集團、國家開發銀行和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招商局中國基金、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等迅速在 2009 年聯合成立「華人文化產業基金」，由黎瑞剛負責操盤。CMC 成立之後開展許多海內外併購投資案。包括 2010 年收購梅鐸的星空衛視；2012 年 8 月和好萊塢夢工廠（Dream Works）合資成立「上海東方夢工廠影視技術有限公司」；2014 年以 8000 萬美元認購 IMAX 中國控股公司。2015 年 12 月和中信資本斥資 4 億美元，入股英超曼城俱樂部母公司城市足球集團 13% 股權。2016 年 3 月宣布入股好萊塢影視製作公司 Imagine Entertainment（想像娛樂）。

2. 打進香港

CMC 亦積極進入香港傳媒產業。2011 年 TVB 轉手之後，2012 年 8 月 8 日，CMC、上海東方傳媒即與 TVB 合資在上海成立「翡翠東方傳播有限公司」。2015 年 4 月，黎瑞剛成為 TVB 成立以來首位中資主要股東，跟黎瑞剛關係密切的許濤獲委任為公司非執行董事。2015 年 7 月，黎瑞剛企圖聯合騰訊和陳國強在香港收購美克企業，透過「借殼」的手段，持有香港上市公司。此買賣意圖規避政府管制，遭到香港聯交所強迫取消交易。但黎瑞剛不死心，改在 2016 年 1 月收購美克 29.55% 股權，避開不得高於 30% 的全面收購觸發點。華人文化入股美克國際，易名為邵氏兄弟控股（李潔儀，2016 年 3 月 8 日）。2015 年 9 月

22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在 9 月 20 日，美國華納兄弟（Warner Bros.）宣布將與 CMC 共同成立新電影公司「旗艦影業」（Flagship Entertainment），並把總部設在香港。新華社將旗艦影業的成立形容為「戰略合作」和「中美兩國人文交流的實質成果」。黎瑞剛表示，旗艦影業的目標是製作有國際化視野的中國電影，而具體表現就例如對白會有普通話、粵語和英文（〈旗艦影業正式成立，中美聯姻能帶領華語電影走向世界嗎？〉，2015 年 9 月 21 日）。

3. 違反香港法例 獲得豁免特許

2015 年 TVB 股權改組之後，董事局成員也發生變化，同年王雪紅退出非執行董事一職，另外加入與黎瑞剛關係緊密的許濤。此外陳國強擔任主席，李寶安擔任執行董事和集團行政總裁。但當中黎瑞剛、陳國強、許濤和李寶安等四人的身分卻抵觸香港《廣播條例》，是「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黎瑞剛不符合的理由是他具有廣告宣傳代理商的身分（廣告公司 WPP plc 的非執行董事和中國廣告公司昌榮傳媒的董事）。而另外三人同時擔任邵氏兄弟和旗艦影業的董事，是黎瑞剛的相聯者，也成為「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

但在 2016 年 8 月 16 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宣布批准這四位「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者對無線行使或繼續行使控制。給予法律豁免的理由為：

黎瑞剛擔任董事的兩家廣告宣傳代理商並沒有在香港市場營運…無線與邵氏兄弟／旗艦影業／CMC 集團旗下公司則在不同的服務市場營運…四人同時擔任無線及上述公司的董事，不大可能會對電視市場的競爭環境產生負面影響，或導致編輯觀點單一化或媒體擁有權過分集中的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6 年 8 月 16 日）。

然而香港特區政府的這項法律豁免，卻引來學者與社會的擔憂。因為黎瑞剛具有中共黨員、中國官員以及資本家的三合一身分，而 CMC 背後更是中國國務院支持的投資基金，擔心這項豁免等同是為紅色資本介入香港最大的電視台開了綠燈（倪清江，2016 年 8 月 16 日）。

TVB 股權自 2011 年易手給陳國強、王雪紅和 PEP，引起資金來源不明的爭議。到 2015 年 4 月，陳國強宣布代表中國資本的黎瑞剛正式進入 TVB，而私募基金 PEP 在 2016 年 6 月宣布退場。中國國家資本是否透過 PEP 私募基金作為進入 TVB 的手段，如同 PEP 的資金來源不透明，外界難以確認，但 2015 年 4 月，中國國家資本進入 TVB，2016 年 8 月獲得香港政府的豁免權，正式進入香港最大電視台 TVB 則是肯定的。

4. 代理人之後還有代理人？

為了擴大對 TVB 的股權控制，黎瑞剛在 2017 年 1 月 24 日宣布動用 42.09 億港元資金進行股權回購計畫，但這項行動卻反而暴露出黎瑞剛等人涉嫌欺瞞香港通訊局的行為。根據規定，單一大股東 YL 的持股比例增加並觸及 30% 的全面收購點，必須要向小股東提出全面收購。但是黎瑞剛不想提出全面收購，所以透過 YL 向香港證監會提出申請豁免。為了進行審查，證監會收購合併委員會要求 TVB 公布 YL 的詳細架構，結果卻使得背後迂迴的股權安排曝光。

根據證監會的資料，YL 的股權複雜，包含具投票權股份及不具股票權股份。其中具投票權股份，黎瑞剛任大股東的 CMC、陳國強以及王雪紅分別持有 32%、56.51% 以及 11.49%。但不具投票權股份方面，卻變成 84.16%、0% 及 15.4%。而綜合股權資料，最終 CMC、陳國強

及王雪紅三方，分別持有 79.01%、6% 及 14.99% 的股權（陳珽明，2017 年 5 月 11 日）。黎瑞剛的 CMC 實際持有 YL 的 79% 股權，較 TVB 主席陳國強還要多。另外，黎瑞剛對委任 YL 董事有否決權及提名權。

表一：Young Lion 的真實股權結構

	黎瑞剛	陳國強	王雪紅
具投票權股份	32%	56.51%	11.49%
不具投票權股份	84.16%	0%	15.4%
綜合股權	79.01%	6%	14.99%

資料來源：〈TVB 大股東曝光「中國梅鐸」控傳媒〉，陳珽明，2017 年 5 月 11 日，《臺灣醒報》，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2457309>。

同時，證監會委員會也同時質疑 CMC 本身是否也存在不同股權架構，黎瑞剛背後是否有其他的代理人。通訊局在證監會提出質疑後於 5 月 18 日表示，已聘請御用大律師審視進行調查（麥燕庭，2017 年 5 月 19 日）。

針對這項風波，無線行政總裁李寶安聲稱沒有隱瞞黎瑞剛的持股情況，但他不願正面回應 TVB 有否向通訊局提交 YL 股東間的兩份協議（麥燕庭，2017 年 5 月 19 日）。黎瑞剛則直至 6 月 23 日才首度發言。他表示 TVB 特殊的股權結構，在他 2015 年初入股之前早已存在。對於《廣播條例》當中必須為香港居民才能當主要股東的規定，則沒有直接評論。但表示，已遵守香港的法規，由本港商人陳國強持有 TVB 大部分投票權（〈黎瑞剛：TVB 股權結構非我發明 稱資料早交通訊局獲批准入股〉，2017 年 6 月 24 日）。

5. 節目審查

除了 TVB 的股權和董事局出現變化外，節目內容和形式也發生變化。習近平在 2017 年 6 月 29 日到 7 月 1 日參加香港主權回歸 20 年活動，但其訪港行程，卻導致以批判諷刺知名的港臺時事節目【頭條新聞】被抽調。由於公營的香港電視台在全港的覆蓋率只有 75%-80%。所以長期以來取得香港無線電視的執照要求，就包括播放香港電視台的節目。所以港臺節目【頭條新聞】應該如往常在無綫電視翡翠台的 2017 年 6 月 30 日傍晚 6 時播出。但當日開播前 8 分鐘，TVB 才以「將會插播突發新聞」的理由用電郵通知港臺須調動節目，最後並調到 J5 台的夜間 12:30。

最後港臺發現更動理由不真，並無突發新聞。相反的是 30 分鐘，播放了 15 分鐘習近平的預錄發言以及 15 分鐘的風水節目。對此抽調事件，通訊局收到民眾的投訴。港臺機構傳訊組總監伍曼儀表示，港臺當日沒有正式同意無綫電視調動【頭條新聞】，而習近平全文講話屬預錄節目，並非不可預計、必須在該時段播放的突發新聞。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批評「偏偏在【頭條新聞】這個最敏感、最敢言的節目抽起來播？」並去信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調查事件（〈無綫回應抽【頭條新聞】：播放港台節目是歷史遺留，至今已不合時宜〉，2017 年 7 月 5 日）。【頭條新聞】主持人吳志森表示團隊趕製節目至下午 4 點才拍完所有片段，內容以習近平訪港打頭陣，諷刺他來港時要封閉多條道路，市民即使想慶祝回歸，也被水馬擋在外面。也總結特首梁振英的五年任期內所有的爭議事件，節目最後更以內地民運人士劉曉波患癌，播出民陣集會要求釋放劉曉波作結。節目團隊事前對 TVB 抽調節目毫不知情，認為做法極不尊重。吳志森更加擔心，這會成為先例，從此將【頭條新聞】放到深夜時段。他強調，無綫續牌條件是要播放港臺節目，但

無綫已經停播另一港臺節目【頭條新聞】。加上播出時間由無綫控制，【頭條新聞】被調到深夜時間並不出奇，要視乎港臺能否「企硬」（翁維愷，2017年6月30日）。

三、香港無線電視執照發放

兩家免費電視台的長年壟斷越發引起香港市民的不滿。香港通訊局在2013年2月至3月，收集了7600份公眾建議書，並在2013年8月6日發表報告書，詳述了公眾的意見，反映觀眾非常不滿ATV和TVB的表現。對亞視的批評有「立場偏頗，失實，誤導，粗製濫造，屬低成本製作」等，對TVB的批評有「該台節目粗製濫造，品味低劣，低俗，低智，意識不良，賣弄色情，製作技術水準低」等（〈ATV：重播節目為免觀眾錯過〉，2013年8月6日）。香港獨立媒體也在2013年3月27日至4月2日期間進行「無線亞視電視服務意見」網上問卷調查，市民對無線TVB的不滿意度達87%，對亞視ATV的不滿意度高達96%，更有99%的受訪者贊成政府立即發放三個申請中的免費電視牌照（方鈺鈞，2013年4月2日）。

面對社會強烈要求發放新執照打破壟斷局面的要求，香港政府在2009年7月，由當時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的劉吳惠蘭給予正面回應，於2009年12月開始接受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三間提交申請的公司包括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吳光正的奇妙電視以及李澤楷的香港電視娛樂。

王維基在2009年12月31日提出申請後，迅即在2010年8月成立香港媒體製作及2012年2月成立「城市電訊電視部」。並為了籌集投資香港電視所需要的巨額資金，在2012年4月出售其事業發展的起

點，香港和加拿大的固網及 IDD 電訊業務（香港寬頻），籌得 50.12 億元，展現集中資源發展電視業務的決心。2012 年 12 月 4 日舉行新台命名及節目試映禮，宣布新電視台名為「香港電視」。2013 年 5 月 24 日，港視將部分劇集片段上傳 YouTube。同時，無綫和亞視極力維持其寡頭壟斷的優勢，動用資源強烈反對港府發放新電視執照。亞視利用【微播天下】的節目抹黑競爭對手王維基（〈不容公器私用，終止亞視牌照——獨立媒體（香港）就無綫電視及亞洲電視節目質素意見書〉，2013 年 4 月 2 日），更在 2012 年 11 月 9 日動員亞視員工集會抗議。無綫電視則在 2013 年初控告通訊事務管理局和前廣管局，藉此拖延發牌時間（〈TVB 提司法覆核圖阻發牌〉，2013 年 1 月 4 日）。

港府在 2013 年 10 月 15 日宣布頒布免費電視牌照給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而最積極準備的香港電視則不獲發牌，因執照遲遲未得而持續失血的香港電視於訊息公布後翌日宣布逐步解僱所有員工。對此引起社會高度爭議的決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和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基於行政會議的保密原則，不能夠公開交代原因，僅指出涉及「一籃子」因素。政府拒絕提出說明的態度更加激發香港社會不滿，在 2013 年 10 月 20 日有 12 萬市民遊行和佔據政府總部門外「公民廣場」。抗議群眾著黑衣上街，並高舉各式口號牌，表達對港府拒發執照的抗議。這些口號反映了香港社會對此事件的感受，包括對香港電視結構長年由無線電視和亞視雙元壟斷的不滿，舉著寫有「日日夜夜睇悶劇事事旦旦無運行」、「唔要師奶劇 電視要改革」的抗議牌。群眾認為執照發放的過程是「黑箱作業」，特首梁振英「一男子」的意見就否決社會的期待，高喊「拒絕不明不白」。認為香港社會走向惡化，而今連看電視的卑微權利都被侵害，「你做你走狗 我要睇電視」，並提出「還我電視選擇權」（〈香港 12 萬黑衫軍 怒吼「還我電視」〉，2013

年 10 月 21 日)。

2013 年 10 月不獲發牌之後，王維基另闢蹊徑，試圖改以行動電視的方式進入電視產業，並在 2013 年 12 月 21 日收購中國移動香港旗下的香港行動電視服務及成立「香港流動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並宣布在 2014 年 7 月 1 日啟播（黃俊邦，2013 年 12 月 20 日）。然而港府再次阻止王維基進入電視產業，指出王維基經營行動電視不符合《廣播條例》（〈覆核流動電視牌 港視敗訴〉，2015 年 9 月 30 日）。無法進入家用電視產業的王維基，只得改做網上電視和購物平台。2014 年 11 月 19 日正式開台，將之前為了開辦電視台招兵買馬製作的電視劇上傳到網路平台（〈申請電視牌遭拒 港視網路 TV 開播〉，2014 年 11 月 19 日）。但因網路電視缺乏穩定收入來源，無法持續投資製作新節目，以致網路電視在 2015 年 12 月隨著舊節目播映完畢以及員工的持續離開進入停滯狀態，僅剩前景不佳的網路購物繼續存在（〈王維基：電視無得做〉，2015 年 6 月 20 日）。此案顯示港府以各種手段阻止王維基進入香港電視，歷經 6 年的投資失血及最終無法獲得執照，迫其放棄電視夢。而王維基的電視夢與挫折，並非起自 2009 年的執照申請。在 2008 年時，萎靡不振的亞視，聘請王維基出任亞視行政總裁。但王上任僅 12 天就被迫離職。

王維基被迫辭職的原因，主要在其發言得罪亞視親北京的董事會，他說：

如果我們要改變大家對這家電視台的觀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一定要新聞部保持中立和專業。雖然內部同事的想法並不是這樣，但我們不可以讓外界覺得我們是左派的。……亦一定要制止觀眾將我們標籤為「中央十台」。……要一個真真正正中立的新闻台（王維基，2008 年 12 月 12 日）。

王維基又說，如果亞視要變成國內台，他沒興趣，因為亞視是一個香港人的電視台，即使有中共支持，他也不要，因為這樣並非長遠，他不要短暫的光輝（王維基，2008 年 12 月 12 日）。

面對自己由於發言被迫請辭一事，王也作了書面聲明，他堅持亞視始終是香港人的電視台，強調這個方向正確，主張亞視要重新定位，不可長期依靠所謂的賑助。他並表明「沒有膽識，便幹不了大事」，但自己主張的改革卻遇到了「固有利益的強大阻力」（〈亞視高層王維基離職留聲 亞姐黑幕仍未揭開〉，2008 年 12 月 18 日）。

港府阻止王維基進入電視產業一事，反映香港的廣電產業因資本家的政治態度而設下不同的門檻，親北京的吳光正與李澤楷獲得免費電視執照，而積極投入並獲得民眾支持的王維基，卻因批評亞視為黨的喉舌，以及公開表達希望新聞部保持中立和專業而被迫離開亞視。爾後王維基申請電視執照，則是歷經一連串的打壓，使其在持續投入資金、精力後，依舊無法獲得執照。除了市民不滿，前通訊事務管理局主席的大律師何沛謙更在 2017 年 4 月 15 日於香港電台一台發表「香港家書」中提到，對於政府沒有採納通訊局的建議向港視發出新免費電視牌，他和很多人一樣感到驚奇。更失望的是：

其實市民看不到政府所作一個同他們期望相差那麼遠的決定的實質理據何在，在 3 個申請者之中，被選中那兩家如何比好進取的港視優勝呢？而表面上受歡迎的港視又如何被比下去？在這件事上我不覺得最終市民大眾得到一個滿意的解釋（〈前通訊局主席 何沛謙「香港家書」：政府拒發牌予港視最終無滿意解釋〉，2017 年 4 月 15 日）。

王維基申請香港免費電視牌照一事，顯示香港特區政府無法以「一籃子」說法說服社會，執政的合法性面臨了來自外部和內部的質疑，甚

至連前主管通訊事務業務的官員，直至卸任都為此耿耿於懷。也暗示了香港媒體產業所能容納的資本家，是否將僅侷限於侍從政治內。

四、研究發現與結論

透過對 1997 年之後香港無線電視所有權變更以及新廣電執照的發放過程分析，發現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深刻影響香港傳媒的結構。

1. 中國侍從政治境外擴張的特色：非正式化、貪污式網絡以及表態政治

過往對中國侍從主義的理論研究主要從毛澤東時期延伸到改革開放時期。本研究進一步研究侍從主義，如何自中國境內，往境外擴張。隨著中國越發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核心以及在「向外的主權觀」、「敵我對立觀」的意識形態下，中國政府積極推動「走出去政策」（如「文化走出去」和「一帶一路」等），中國侍從主義的運作，已經自國內擴張至海外。本研究亦證明，侍從主義並未如 Nee 所言會隨著市場經濟深化而消失。甚至相反，香港作為一個市場經濟發展歷史更悠久，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港口，卻日益受到中國侍從主義的影響。

中國侍從主義在境外擴張的特色則包括非正式化、貪污式網絡以及表態政治。第一，中國政府的「文化走出去」政策，意欲積極控制海外的意識形態部門。但各國對於媒體併購案的審查也多持謹慎小心的態度，對持有人的國籍身分、所有權比例、與跨媒體經營進行審查。這些法律審查，卻也製造中國政府、中國私營資本家與海外侍從資本家合作遊走法律的空間。本研究發現，為了繞開香港法令對媒體的規管，中國官僚資本家（如劉長樂），透過具有香港身分的資本家（如封小平）出

面成立公司，甚且結合臺籍資本家（如王雪紅）共同合作，利用金融資本操作（如 AB 股和私募基金等），規避香港法令審核，取得港媒控制權。這些變化顯示改革開放政策之後，Paik 與 Baum（2014）所指的「中國特色侍從主義」（Cliente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已經向外擴張。亦如 Pearson（1997）分析，後毛後的侍從政治從「正式性轉向非正式化」，當中的灰色交易與隱匿性，讓外界難以看清當中關連。第二，作為人頭的陳國強直言「作為香港人，很划算」，一語道出加入侍從政治的運作，可獲得不小的尋租空間。香港證監會與通訊局舉報的不法情事，亦證實 Wank 所指侍從主義已經轉變成新型態的貪污網絡（corruption network; Wank, 1995, 1999, 2002）。第三，表態政治的運作，迅速改變香港傳媒的所有權分布與政治立場。侍從政治透過國家權力的控制，影響私營企業主的自主性，而私營企業者也在表態政治中，出現是否參與侍從政治的不同立場。Milhaupt 與 Zheng（2015）對政治關係的有無如何影響私營企業進行分析，指出有政治關係者可以獲得低成本融資、上市的機會、市場接近權等好處；沒有政治關係者，只能處於市場的邊緣。王維基的案例清楚顯示，被打壓的資本家，如何持續被政府剝奪在香港經營電視的機會。香港記協的調查則顯示，侍從政治已經對香港傳媒經營者產生具體影響，香港 26 間主流傳媒中，已有 9 間機構，約 35% 由中國政府控制，或由中資企業入股。包括無線電視（TVB）、《南華早報》、《大公報》、《文匯報》、《香港商報》、《中國日報香港版》、《成報》、鳳凰衛視、以及被永升收購的有線寬頻（i-Cable）。另外，約有 85% 的主流媒體老闆或新聞部主管獲委任為建制成員，或曾經受勳（〈香港記者協會：35% 媒體受中國政府控制或中資入股〉，2017 年 7 月 2 日）。

表態政治催化媒體所有權與政治立場向親建制派靠攏，也導致新聞

自由環境惡化。國際記者聯會在 2018 年發布報告，指出過去十年（2008 年至 2017 年）香港最少發生 131 宗針對媒體的侵害事件。新聞自由的惡化則與港澳自治權的萎縮相關，因為中國政府認為，「任何的新聞自由都有礙他們控制香港，並使用經濟力量、政治壓力、法律手段，以及街頭暴力，干擾報道及消滅批評聲音。」（〈國際記者聯會：香港十年內逾百宗侵害媒體事件 促港府勿閉門放風〉，2018 年 2 月 2 日）。

2. 中國官僚資本對香港傳媒控制的表面化與正式化

本研究亦結合對侍從主義的研究，以及中共政權韌性與資本家階級的研究，分析中國侍從主義境外擴張過程中，不同資本家類型在當中的角色與作用。亞視和 TVB 的案例證明，「中國官僚資本家」首先透過香港資本家、海外侍從資本家以及私募基金出面經營香港傳媒一段時期。一段時期後，再申請香港特首對其不具持牌資格人的法律豁免權，正式取得香港電視的經營資格。如劉長樂在 1998 年透過香港資本家封小平經營亞視，在 2002 年取得豁免權。TVB 在 2011 年轉手給 YL 集團（包括香港資本家陳國強、臺籍資本家王雪紅、美國私募基金 PEP）。2015 年 4 月，陳國強宣布黎瑞剛入主 TVB，中國資本正式浮出。2016 年黎瑞剛等，取得特首的法律豁免權。當中清楚得見中國官僚資本、中國私營資本以及海外侍從資本的協同運作。同時，中國官僚資本最後透過政治力量將身分合法化，正式浮出檯面，取得正式經營權。

3. 法治治理危機深化

香港傳媒併購與新執照發放過程，反映法律作為 Louis Althusser 所言的意識形態上層結構（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SAs），伴隨著香港的政治經濟權力鬥爭，亦處於變化的前沿，面臨激烈的挑戰。法律的

詮釋權，受到權力的擠壓，產生不一致的結果。同樣的《廣播條例》，港府授予親政府資本家法律豁免，對反對者卻是擴大解釋條文，積極打擊。

但香港法治也非鐵板一塊，需動態檢視行政部門在不同權力位置下的措施與反應。例如 2015 年 7 月，黎瑞剛企圖透過「借殼」手段持有香港上市公司，卻被香港聯交所發現並強迫取消交易。2017 年香港證監會發現黎瑞剛等人透過玩弄 AB 股的手段取得 TVB，通訊局也在證監會提出質疑後聘請御用大律師進行調查。

但上述依法行政的空間卻也面臨挑戰。通訊局聘請的大律師調查結果尚未出爐，但 2017 年 7 月 1 日上任的特首林鄭月娥，旋即在 10 月的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政府有意放寬電視和聲音廣播條例的規管，並在 2018 年 2 月發布諮詢文件。整個立法方向以鬆綁為目的（deregulation），特別是放寬非本地資本以及跨媒體經營。主要內容包括：第一，放寬非本地股東持有免費電視股份的最低門檻，由持股 2% 提升至 5%。第二，放寬跨媒體的擁有權。亦即放寬報章的所有權人，可同時持有免費電視、收費電視以及廣播的牌照。第三，放寬持有人身分，刪除對廣告宣傳代理商、非本地電視持牌人、其他須領牌電視持牌人、本地報刊東主等不得擔任持牌資格人士的限制。第四，放寬持有人非直系親屬的限制，如父母的兄弟姊妹／其配偶、表堂兄弟姊妹等。所以持有人在人頭安排上，有更大空間。第五，取消免費電視或聲音廣播牌照不得批給任何屬某法團的附屬公司的規定。這項規定的放寬，也有利於龐大的集團安排旗下子公司、子子公司出面取得牌照。第六，大的牌照控制在行政長官會議，其他小牌照則由通訊局審批。此規定使行政長官可不需顧及通訊局的意見，直接決定主要廣電媒體的分配（免費電視、收費電視和聲音廣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8 年 2 月）。

黎瑞剛投資 TVB 事件反映香港媒體併購案已經出現法治治理危機

(legal governance crisis)。此危機因為不同行政部門的查察（證監會、通訊局），浮出檯面。過往非法經營香港傳媒者，透過申請法律豁免權，取得合法身分。但在 2017 年，香港特首宣布修法放寬，違法者或可因此直接解套。此種不斷鬆動香港法治的方向，顯示香港法治治理危機的進一步深化。

4. 灰色侍從政治 侵蝕民主原則

為了規避法令，侍從政治以灰色交易的型態在香港出現，本質上不僅不穩定，且充滿操弄。例如劉長樂找封小平當代理人，封卻想自行取代；查懋聲一股兩賣，既和臺灣的蔡衍明談條件，卻又再找王征合作。TVB 的收購案更出現以兩種版本蒙騙香港通訊局。同時，各種資本工具的運用，包括資本代理人（人頭）、離岸公司、私募基金、空殼公司、子公司、AB 股權等形式，構成複雜的結構性詐騙。致使當地行政部門、社會與學者難以獲悉正確清楚的資訊，進行調查審批與公共討論。甚至，媒體在控制下，成為影響公共決策和民意的工具。例如為了阻擋港府發放執照給王維基，王征要求亞視員工遊行抗議；為了迎接習近平訪港，TVB 抽調《頭條新聞》節目播放時間。但這些違反香港法治、民主規則的事件，卻因資本主義對資本流動的鼓勵，與港府的行政豁免，而顯得合法，就如黎瑞剛辯白「已遵守香港法制」。也因此，民眾一方面感受到資訊不透明、潛規則運作與社會混亂，另一方面，卻得面對媒體併購案形式合法，民間難以發言介入的弔詭處境。

中國政府透過侍從政治與資本手段，對外擴張政治勢力，雖可越過國家主權限制，將影響力伸展到其他領土，但此種擴大方式，卻也損害其正當性與對話的誠意，近年臺港媒體併購案引發的種種爭議即為一例。Natalia Roudakova 對「媒體政治侍從主義」（media-political clientelism）

的研究指出，侍從主義下的「庇護者」們將「民意」視為鬥爭奪權的武器。透過掌握媒體，為自己和團夥正面宣傳與攻擊敵人。媒體被工具化，媒體工作者被迫成為宣傳的幫手，而非專業客觀的報導者。2016 年香港成報一系列攻擊梁振英和中聯辦的頭版報導，以及與文匯報大公報的相互攻訐，正是香港傳媒被當作鬥爭工具的具體事例。侍從主義也破壞媒體工作者之間的橫向團結，鼓勵各個勞動者與上層建立關係，加入庇護者們的政商網絡，成為親密的自己人（Roudakova, 2008, p. 43）。侍從主義肆虐下的媒體勞動者、市民與社會則成了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除了被中國侍從主義衝擊的臺灣與香港社會外，為中共「文化走出去」千億支出買單的中國大陸納稅人、銀行存款戶、股民也是被損害的輸家。特別是當中許多餽贈給侍從者的灰色交易，如土地審批、上市許可、特許壟斷等，加深社會矛盾與不公。例如中國首富王健林藉由「文化走出去」政策，大肆在海外併購娛樂產業、足球隊、旅館等。根據統計，王健林自 2012 年收購美國 AMC 電影院以來的五年，海外投資金額已高達 2541 億人民幣，相當於中國外匯存底的 1.3% 左右。至 2017 年年中，萬達在中國的土地儲備也高達 7332.6 萬平方公尺（李曉青，2017 年 7 月 11 日）。

以「文化走出去」的愛國旗手為名，在國內大肆圈地借貸，在海外投資置產，此種名財兩得的美事，也終遭中國政府警告。為了遏止中國資金外流，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 2017 年 3 月 10 日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批評，中國對外投資總體是個比較新興的事物，叫「中國企業走出去」，但有些對外投資和產業政策不符合，比如俱樂部和娛樂等，對中國沒什麼太大好處，在國外引起了抱怨，對此進行一定指導是有必要的（〈萬達拋售資產 陸官方意在防堵資金外流〉，2017 年 7 月 21 日）。對此，中國經濟學者何清漣表示，中國政府現在的措施是，

「正準備流出去的要堵住，已經流出去的要秋後算帳」（〈萬達拋售資產 陸官方意在防堵資金外流〉，2017年7月21日）。遭到中共官媒點名批評的王健林除了急忙拋售資產外，也積極表態效忠。除了用「令人自豪、很受鼓舞、非常激動」形容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也表示要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把主要投資放在中國，參與甘肅「脫貧攻堅」，與在蘭州建設大型文化旅遊項目（楊青之，2017年10月18日）。

王健林一例清楚顯示侍從關係建立在權力不對等的基礎，侍從者在庇護者的允准下尋租，在文化走出去與中國夢政策對海外擴張的支持下，在境外積累財富與影響力。本研究發現，侍從政治與金融資本的結合運用，使中國政府得以越過主權限制，擴張對境外的控制。中國侍從政治境外擴張的特色，則包括非正式化、貪污式網絡與表態政治。隨著中國在港政治影響力的深化，中國官僚資本對香港傳媒的控制，也透過法律豁免權，從隱身於後正式浮出檯面。此外，香港特首進一步提出去管制化的修法主張，反映出香港媒體已經處於法治治理危機，依法行政的空間受到挑戰。灰色侍從政治的運作，亦侵蝕民主原則，使新聞自由越益惡化。相對各地資本家，透過中共「走出去」政策，建立跨地區、跨產業、「黨—官—資」三位一體的權力者聯盟，或許各地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民也該相互串連聲援，進行跨區域結盟，對抗侍從主義將媒體工具化的傾向，讓媒體重新展現其賦權（empower）的能力。

參考書目

- 〈ATV：重播節目 為免觀眾錯過〉（2013年8月6日）。《主場新聞》。瀏覽日期：2013年8月6日，取自
<http://thehousenews.com/society/atv-%E9%87%8D%E6%92%AD%E7%AF%80%E7%9B%AE-%E7%82%BA%E5%85%8D%E8%A7%80%E7%9C%BE>

- E9%8C%AF%E9%81%8E/ (N/A)
- 〈TVB 提司法覆核圖阻發牌〉 (2013 年 1 月 4 日)。《蘋果日報》。取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104/18123031>
- 〈TVB 染紅 新股東與大陸官方關係密切〉 (2015 年 4 月 22 日)。《立場新聞》。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tvb%E6%9F%93%E7%B4%85%E4%B8%AD%E8%B3%87%E5%85%A5%E8%82%A1/>
-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 (2014 年 6 月 10 日)。《新華網》。瀏覽日期：2014 年 6 月 11 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4-06/10/c_1111067166.htm (N/A)
- 〈人大演說 習近平大談強軍中國夢〉 (2013 年 3 月 18 日)。《自由時報》。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19 日，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662713> (N/A)
- 〈不容公器私用，終止亞視牌照——獨立媒體 (香港) 就無綫電視及亞洲電視節目質素意見書〉 (2013 年 4 月 2 日)。《香港獨立媒體網》。取自 <http://www.inmediahk.net/taxonomy/term/512421>
- 〈王維基：電視無得做〉 (2015 年 6 月 20 日)。《蘋果日報》。取自 <https://hk.finance.appledaily.com/finance/daily/article/20150620/19191435>
-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港獨嚴重違法 在全球零空間〉 (2017 年 9 月 29 日)。《蘋果日報》。取自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70929/57270857>
- 〈申請電視牌遭拒 港視網路 TV 開播〉 (2014 年 11 月 19 日)。《蘋果日報》。取自 <https://tw.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20141119/36216041/%E7%94%B3%E8%AB%8B%E9%9B%BB%E8%A6%96%E7%89%8C%E9%81%AD%E6%8B%92%E6%B8%AF%E8%A6%96%E7%B6%B2%E8%B7%AFTV%E9%96%8B%E6%92%AD>
- 〈亞視高層王維基離職留聲明 亞姐黑幕仍未揭開〉 (2008 年 12 月 18 日)。瀏覽日期：2008 年 12 月 18 日。《北方網》。取自 <http://ent.big5.enorth.com.cn/system/2008/12/18/003832350.shtml> (N/A)
- 〈亞視集會反對發新電視牌〉 (2012 年 11 月 12 日)。《東方日報》。取自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21112/00176_011.html
- 〈香港 12 萬黑衫軍 怒吼「還我電視」〉 (2013 年 10 月 21 日)。《蘋果日報》。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31021/35379567/>
- 〈香港記者協會：35% 媒體受中國政府控制或中資入股〉 (2017 年 7 月 2 日)。《BBC 中文網》。取自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0472207>
- 〈通訊局飭令亞視 踢走王征盛品儒〉 (2012 年 6 月 28 日)。《東方日報》。取自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20628/00176_005.html

流動的資本與走出去的中國：以香港無線電視產業的資本併購與執照審查為例

- 〈前通訊局主席 何沛謙「香港家書」：政府拒發牌予港視 最終無滿意解釋〉（2017年4月15日）。《立場新聞》。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89%8D%E9%80%9A%E8%A8%8A%E5%B1%80%E4%B8%BB%E5%B8%AD-%E4%BD%95%E6%B2%9B%E8%AC%99-%E9%A6%99%E6%B8%AF%E5%AE%B6%E6%9B%B8-%E6%94%BF%E5%BA%9C%E6%8B%92%E7%99%BC%E7%89%8C%E4%BA%88%E6%B8%AF%E8%A6%96-%E6%9C%80%E7%B5%82%E7%84%A1%E6%BB%BF%E6%84%8F%E8%A7%A3%E9%87%8B/>
- 〈習近平批評少數外國人對中國指手劃腳〉（2009年2月13日）。《深圳衛視》。瀏覽日期：2009年2月13日，取自
<http://www.peacehall.com/forum/200902/boxun2007b/422757.shtml> (N/A)
- 〈習近平考察廣州戰區 登甲板上戰車〉（2012年12月13日）。《新京報》。取自 <http://mil.sohu.com/20121213/n360290964.shtml>
- 〈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2013年3月17日）。人民網。取自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18/c40531-20819774.html>
- 〈習近平九提「中國夢」〉（2013年3月17日）。《中新社》。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lh/2013-03/17/c_115054547.htm
- 〈習近平：不應干涉別國內政〉（2013年3月23日）。《中央社》。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303230191-1.aspx>
- 〈國際記者聯會：香港十年內逾百宗侵害媒體事件 促港府勿閉門放風〉（2018年2月2日）。《立場新聞》。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5%9C%8B%E9%9A%9B%E8%A8%98%E8%80%85%E8%81%AF%E6%9C%83-%E9%A6%99%E6%B8%AF%E5%8D%81%E5%B9%B4%E5%85%A7%E9%80%BE%E7%99%BE%E5%AE%97%E4%BE%B5%E5%AE%B3%E5%AA%92%E9%AB%94%E4%BA%8B%E4%BB%B6-%E4%BF%83%E6%B8%AF%E5%BA%9C%E5%8B%BF%E9%96%89%E9%96%80%E6%94%BE%E9%A2%A8/>
- 〈通訊局不建議亞視續牌〉（2014年11月25日）。《香港經濟日報》。取自
<http://topick.hket.com/article/482335/%E3%80%90%E4%BA%9E%E8%A6%96%E7%BA%8C%E7%89%8C%E3%80%91%E9%80%9A%E8%A8%8A%E5%B1%80%E4%B8%8D%E5%BB%BA%E8%AD%B0%E4%BA%9E%E8%A6%96%E7%BA%8C%E7%89%8C>
- 〈殼王擅「代客泊車」 真正買家惹討論〉（2011年1月28日）。《明報》。瀏覽日期：2011年1月28日，取自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10128/StockWarrant/rd_gha3.htm (N/A)
- 〈殼王買無線 巧佈股權避法例〉（2011年1月29日）。《明報》。瀏覽日期：

2011 年 1 月 29 日，取自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10129/News/ea_eaa1.htm (N/A)

〈無綫回應抽【頭條新聞】：播放港台節目是歷史遺留，至今已不合時宜〉（2017 年 7 月 5 日）。《眾新聞》。取自 <https://www.hknews.com/article/5120/%E7%84%A1%E7%B7%9A%E9%9B%BB%E8%A6%96-%E9%A0%AD%E6%A2%9D%E6%96%B0%E8%81%9E-%E9%A6%99%E6%B8%AF%E9%9B%BB%E5%8F%B0-5125/%E7%84%A1%E7%B6%AB%E5%9B%9E%E6%87%89%E6%8A%BD%E3%80%8A%E9%A0%AD%E6%A2%9D%E6%96%B0%E8%81%9E%E3%80%8B%EF%BC%9A%E6%92%AD%E6%94%BE%E6%B8%AF%E5%8F%B0%E7%AF%80%E7%9B%AE%E6%98%AF%E6%AD%B7%E5%8F%B2%E9%81%BA%E7%95%99%EF%BC%8C%E8%87%B3%E4%BB%8A%E5%B7%B2%E4%B8%8D%E5%90%88%E6%99%82%E5%AE%9C>

〈萬達拋售資產 陸官方意在防堵資金外流〉（2017 年 7 月 21 日）。《中央社》。

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707210281-1.aspx>

〈劉長樂上場 封小平下臺〉（2002 年 6 月 13 日）。《蘋果日報》。取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20613/2656311>

〈劉長樂非港居民特准增持〉（2002 年 6 月 13 日）。《蘋果日報》。取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20613/2656315>

〈旗艦影業正式成立，中美聯姻能帶領華語電影走向世嗎？〉（2015 年 9 月 21 日）。《端傳媒》。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21-dailynews-cmc-time-warner/>

〈談投資《南早》 馬雲：從不干預媒體 入股非對新聞感興趣〉（2017 年 12 月 4 日）。《立場新聞》。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hina/%E8%AB%87%E6%8A%95%E8%B3%87-%E5%8D%97%E6%97%A9-%E9%A6%AC%E9%9B%B2-%E5%BE%9E%E4%B8%8D%E5%B9%B2%E9%A0%90%E5%AA%92%E9%AB%94-%E5%85%A5%E8%82%A1%E9%9D%9E%E5%B0%8D%E6%96%B0%E8%81%9E%E6%84%9F%E8%88%88%E8%B6%A3/>

〈蔡衍明親述亞視股爭〉（2009 年 12 月 25 日）。《東周網》。取自

<http://eastweek.my-magazine.me/index.php?aid=4759>

〈黎瑞剛：TVB 股權結構非我發明 稱資料早交通訊局 獲批准入股〉（2017 年 6 月 24 日）。《明報》。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624/s00004/1498240616767

〈覆核流動電視牌 港視敗訴〉（2015 年 9 月 30 日）。《東方日報》。取自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50930/00176_067.html

方鈺鈞（2013 年 4 月 2 日）。〈九成市民「極不滿意」亞視 99% 支持發新電視牌〉，《香港獨立媒體網》。取自 <http://www.inmediahk.net/99>

王維基（2008 年 12 月 12 日）。〈豈有此理的「中央十台」標籤〉，《頭條日

- 報》。取自 http://news.stheadline.com/dailynews/headline_news_detail_columnist.asp?id=66726§ion_name=wtt&kw=27
- 何清漣、程曉農（2017）。《中國：潰而不崩》。臺北：八旗文化。
- 李潔儀（2016年3月8日）。〈華人文化入股想像娛樂 黎瑞剛組建荷裡活金像獎班底〉，《大公報》。取自 <http://finance.takungpao.com.hk/gscy/q/2016/0308/3290064.html>
- 李曉青（2017年7月11日）。〈王健林賣掉國內近八成持有項目 海外投資已近2500億〉，《澎湃新聞網》。取自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29125
- 周松欣（2016年4月21日）。〈馬雲專訪 Q&A：暢談中國經濟、香港問題及南早動向〉，《南華早報》。取自 <http://www.nanzao.com/tc/national/15433669ad7a17a/ma-yun-zhuan-fang-q-a-chang-tan-zhong-guo-jing-ji-xiang-gang-wen-ti-jin-nan-zao-dong-xiang>
- 林孟儀（2011年2月9日）。〈股王、殼王與私募聯手打了場好球〉，《今週刊》，第738期。取自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3/post/201102100011/%E5%8F%B0%E3%80%81%E6%B8%AF%E3%80%81%E7%BE%8E%E7%B5%84%E5%9C%98%E6%94%B6%E8%B3%BC%EF%BC%B4%EF%BC%B6%EF%BC%A2%E8%82%A1%E6%AC%8A>
- 林靖東（2012年5月8日）。〈蔡衍明黎智英的恩怨江湖〉，《海峽導報》。取自 <http://big5.huaxia.com/tslj/rdrw/2012/05/2840233.html>
- 亞裏（2015年1月5日）。〈點解節目咁難睇？〉，《立場新聞》。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5%A4%A9%E4%BD%91%E4%BA%9E%E8%A6%964-%E9%BB%9E%E8%A7%A3%E7%AF%80%E7%9B%AE%E5%92%81%E9%9B%A3%E7%9D%87/>
- 胡燕泳（2012年11月18日）。〈來自亞視的聲音〉，《明報》。瀏覽日期：2012年11月25日，取自 [http://news.hk.msn.com/sunday/article.aspx?cp-documentid=251436145\(N/A\)](http://news.hk.msn.com/sunday/article.aspx?cp-documentid=251436145(N/A))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廣播條例》（2012年修訂）。取自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62!zh-Hant-HK?xid=ID_1438403451214_001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6年8月16日）。〈政府批准無線電視「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申請〉。取自 <http://www.cedb.gov.hk/chi/speech/2016/pr16082016a.htm>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2018年2月）。〈電視及聲音廣播規管制度檢討〉。取自 [http://www.cedb.gov.hk/ccib/chi/paper/pdf/BOTORReview_1\(chi\).pdf](http://www.cedb.gov.hk/ccib/chi/paper/pdf/BOTORReview_1(chi).pdf)
- 香港記者協會（2016）。〈2016 Annual Report: One Country Two Nightmares〉。取

自 https://www.hkja.org.hk/site/Host/hkja/UserFiles/file/annualreport/Annual_report_2016_Final%20V.pdf

姚國雄、林俊謙（2014 年 6 月 8 日）。〈打壓 6.22 全民投票 屈和平佔中篡奪政權 周南恐嚇會戒嚴〉，《蘋果日報》。取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608/18749709>

陳珏明（2017 年 5 月 11 日）。〈TVB 大股東曝光 「中國梅鐸」控傳媒〉，《台灣醒報》。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33/2457309>

翁維愷（2017 年 6 月 30 日）。〈無綫抽起《頭條新聞》改播風水節目 港台 8 分鐘前獲通知「插播突發新聞」〉，《眾新聞》。取自

<https://www.hknews.com/article/5001/%E7%84%A1%E7%B7%9A%E9%9B%BB%E8%A6%96-%E6%B8%AF%E5%8F%B0%E9%9B%BB%E8%A6%96-%E9%A0%AD%E6%A2%9D%E6%96%B0%E8%81%9E-5001/%E7%84%A1%E7%B6%AB%E6%8A%BD%E8%B5%B7%E3%80%8A%E9%A0%AD%E6%A2%9D%E6%96%B0%E8%81%9E%E3%80%8B%E6%94%B9%E6%92%AD%E9%A2%A8%E6%B0%B4%E7%AF%80%E7%9B%AE-%E6%B8%AF%E5%8F%B0%E5%88%86%E9%90%98%E5%89%8D%E7%8D%B2%E9%80%9A%E7%9F%A5%E3%80%8C%E6%8F%92%E6%92%AD%E7%AA%81%E7%99%BC%E6%96%B0%E8%81%9E%E3%80%8D->

倪清江（2016 年 8 月 16 日）。〈「中國梅鐸」黎瑞剛獲准加入無綫董事局 學者憂進一步染紅〉，《HK01》。取自

<https://www.hk01.com/%E6%B8%AF%E8%81%9E/37782/-%E4%B8%AD%E5%9C%8B%E6%A2%85%E9%90%B8-%E9%BB%8E%E7%91%9E%E5%89%9B%E7%8D%B2%E5%87%86%E5%8A%A0%E5%85%A5%E7%84%A1%E7%B6%AB%E8%91%A3%E4%BA%8B%E5%B1%80-%E5%AD%B8%E8%80%85%E6%86%82%E9%80%B2%E4%B8%80%E6%AD%A5%E6%9F%93%E7%B4%85>

麥燕庭（2017 年 5 月 19 日）。〈通訊局查 TVB 有否隱瞞中共黨員黎瑞剛是大股東的身分〉，《世界之聲》。取自

<http://trad.cn.rfi.fr/%E6%B8%AF%E6%BE%B3%E5%8F%B0/20170519-%E9%80%9A%E8%A8%8A%E5%B1%80%E6%9F%A5tvb%E6%9C%89%E5%90%A6%E9%9A%B1%E7%9E%9E%E4%B8%AD%E5%85%B1%E9%BB%A8%E5%93%A1%E9%BB%8E%E7%91%9E%E5%89%9B%E6%98%AF%E5%A4%A7%E8%82%A1%E6%9D%B1%E7%9A%84%E8%BA%AB%E5%88%86>

黃俊邦（2013 年 12 月 20 日）。〈港視換平台 明年七一開台 王維基：「為香港人發聲」〉，《香港獨立媒體網》。取自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9709>

楊青之（2017 年 10 月 18 日）。〈王健林聽十九大報告後急忙表態：自豪鼓舞激動〉，《HK01》。取自

流動的資本與走出去的中國：以香港無線電視產業的資本併購與執照審查為例

<https://www.hk01.com/%E5%85%A9%E5%B2%B8/126887/%E7%8E%8B%E5%81%A5%E6%9E%97%E8%81%BD%E5%8D%81%E4%B9%9D%E5%A4%A7%E5%A0%B1%E5%91%8A%E5%BE%8C%E6%80%A5%E5%BF%99%E8%A1%A8%E6%85%8B%E8%87%AA%E8%B1%AA%E9%BC%93%E8%88%9E%E6%BF%80%E5%8B%95>

劉明福（2010）。《中國夢：後美國時代的大國思維與戰略定位》。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

戴瑜慧（2013）。〈中共「文化走出去」政策的新推手：中國私營資本金與海外媒體收購〉，《中華傳播學刊》，24: 3-41。

譚璐、蔣雲翔、鄧紅葉（2010年3月12日）。〈內地地產商控股亞視〉，《21世紀經濟報道》。取自

<https://finance.qq.com/a/20100312/002214.htm>

寶強翻譯工作小組譯（2016）。《巴拿馬文件》，臺北：商周。（原書 Obermayer, B. & Obermayer, F. [2016]. *Panama papers: Die geschichte einer weltweiten Enthüllung*. Cologne, Germany: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

Ang, Y. Y. (2016). Co-optation & clientelism: Nested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China's single-party dictatorship. *Studies i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51(3), 235-256.

Chen, J., & Dickson, B. J. (2010). *Allies of the state: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democratic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oi, E. K. & Zhou, K. (2001). Entrepreneurs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transitional econom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rent-seeking. *The China Review*, 1(1), 111-135.

Dickson, B. J. (2003).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the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ckson, B. J. (2008).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ckson, J. B. (2010). Dilemmas of party adaptation: the CCP's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P. H. Gries & S. Rosen (Eds.), *Chinese politics: State, society and the market* (pp. 22-40). London, UK: Routledge.

Harvey, D. (2010).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dson, W. (2008). Fables of sovereignty. In T. Jacobsen, C. Sampford, & R. Thakur (Eds.), *Re-envisioning sovereignty: The end of Westphalia?* (pp. 19-32). Aldershot, UK: Ashgate.

Jun, D., & Girma, S. (2010). Red capitalists: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Kyklos*, 63(4), 530-545.

Kennedy, S. (2005).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C., He, Z., & Huang, Y. (2006). *Big city, small place: Clientelism and media in Shangha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Dresden, Germany.
- Lewis, M., Sampford, C. & Thakur, R. (2008). Introduction. In T. Jacobsen, C. Sampford, & R. Thakur (Eds.), *Re-envisioning sovereignty: The end of Westphalia?* (pp.1-18). Aldershot, UK: Ashgate.
- Milhaupt, C. T., & Zheng, W. (2015). Beyond ownership: State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firm.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03, 665-722.
- Nee, V. (1989).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a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 663-81.
- Nee, V.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3), 267-282.
- Page, J. (2013, March 13). For Xi, a 'China Dream' of Military Power. *Wall Street Journal*. Retrieved from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127887324128504578348774040546346.html>
- Paik, W., & Baum, R. (2014). Cliente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ocal patronage networks in post-reform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29(4), 675-702.
- Pearson, M. M. (1997).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earson, M. M. (2002). Entrepreneur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s foreign sector. In V. E. Bonnell & T. B. Gold (Eds.), *New entrepreneurs of Europe and Asia: Pattern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Russia,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pp. 130-155). Armonk, NY: M. E. Sharpe.
- Roudakova, N. (2008). Media-political clientelism: Lessons from anthropolog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0(1), 41-59.
- Simpson, G. (2008). The guises of sovereignty. In T. Jacobsen, C. Sampford, & R. Thakur (Eds.), *Re-envisioning sovereignty: The end of Westphalia?* (pp. 51-72). Aldershot, UK: Ashgate.
- Solinger, D. J. (1993).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 1980-90*. Armonk, NY: Taylor & Francis.
- Tsai, K. S. (2007).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sai, K. S. (2011). Comparing China's capitalists: neither democratic nor exceptional. In S. Kennedy (Ed.), *Beyond the Middle Kingd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hina's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pp. 136-15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ang, W.K. (1996). In search of legitimacy: The private entrepreneur in China.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1(1), 21-30.
- Walder, A. G. (1988).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nk, D. L. (1995). Bureaucratic patronage and private business: Changing networks of power in urban China. In A. G.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pp. 153-183).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nk, D. L. (1999).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south China cit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k, D. L. (2002). *Evolving business-state clientelism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of a smuggling ope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oston, MA.
- Young, S. (1995). *Private busines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 Zhang, Y. (2008). Ambivalent sovereignty: China and re-imagining the Westphalian ideal. In T. Jacobsen, C. Sampford, & R. Thakur (Eds.), *Re-envisioning sovereignty: The end of Westphalia?* (pp. 101-118). Aldershot, UK: Ashgate.

China's Go Global Policy and Capital Flow: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the Controversy of New Television Licenses in Hong Kong's Terrestrial TV Industry

Yu-Hui Tai*

ABSTRACT

The frequent capital activitie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linguistic media market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have aroused social controversies and had a great impact on soci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Hong Kong is situated on the frontline and has experienced many kinds of challenges. Due to its value of representativeness around the region, I analyze the changing ownership of ATV and TVB from 1997 to 2017 as well as the controversy of issuing new terrestrial TV licenses in 2009. To symptomatically understand Hong Kong, one must put it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especially it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irst, I comb in detail the theory of clientelism in China from Mao until the present. Second, I dissect the political thinking of the CCP leadership, which provid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Go Global policy and China Dream proclamation. Third, I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capital and the Go Global policy. The research finding shows that cliente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penetrated into HK. Capitalists from China, HK, and Taiwan work together during M&A activities and use

* Yu-Hui Tai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i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capital instruments to circumvent legislation supervision. Moreover, the role of Chinese bureaucratic capitalists has become apparent after obtaining immunity from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complicity of clientele politics, the evasion of legal sanctions, and a deregulation policy that has allowed non-citizens run local media as proposed by the current Chief Executive have demonstrated the deepening crisis of legal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tic principles.

Keywords: clientelism, state capitalism, Go Global, China Dream, merger & acquisition (M&A), financial capital

